

1850年秋，还有僮族潘宝源起义于明江，攻克龙州城。起义军杀清龙州同知兼署太平府王淑元等，继续攻到隆安，克果化州，入上林，纵横左右两江。

除此以外，1850年声势较大的，还有僮族屈承儉、李采强等部数千人活跃于永淳以上沿江一带。吴长腰四部数千人活跃于迁江、荔浦、修仁等县。僮族章世堯部二千余人活跃于庆远府属。其他实力较小的起义军攻克的城池还有迁江、永康、左州、宁明和太平等处。到了太平军起义前后，据清钦差大臣李星阮奏报说：活跃于太平府的有“广义堂”二三千人；纵横镇安府属的有“义胜堂”、“洪胜堂”七八千人；活跃于泗城府的有“永义堂”约千人；思恩府有谢长腰四等部数千人；南宁府的起义军有万余人；粤桂边境则有刘八部万余人；当然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

总之，在1850年，太平军起义的前夕，广西的农民起义遍于全省各地，人数达数十万。所谓“首领数百人”，就是说队伍多至数百支。这些队伍不但是广西的，更有远从湖南和广东来的，这就大大增强了广西农民队伍的力量，形成起义的高潮。当时大的队伍每支竟拥有万余人，一年中攻克大小城池十余座，所到“开仓劫库，放囚杀官”，没收豪富银物，严惩地主士劣，行动纲领明确，而且纪律良好。但由于革命

力量发展迅速，队伍既众多又庞大，未能建立完全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堂号繁多，“每股各有暗号”，存在着分合不定、旋起旋灭、各自为战的現象。敌人说“广西贼势披猖”，但“各自为党”^①，于是得出“此等勤捕尚易为力”^②的结论，结果这些起义军也因此先后被敌人各个击破了。

洪仁玕论述太平军起义前这些农民起义的情况说：因为起义军“聚散无常，漂流靡定”，所以“官兵奉令勤捕”虽“亦常奏功”，但“甚为棘手”^③。这就说明他们缺点很多，但是这些势如暴风骤雨的起义队伍，给清朝廷和地主阶级的打击却是相当严重的，使得农村沸腾，成为太平军的革命前驱。当太平军起义后，众多的起义军和太平军遥相呼应，大大牵制了清军的兵力，在客观上帮助了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太平军后来转战武宣和象州各地，终于突破敌人重围克复永安，创建太平天国。因而可以说，广西的农民起义军在一定程度上替太平军铺平了道路。

① “李星阮奏议”卷二十一。

② “中复堂遗稿”卷二。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四册，第868页。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

王炳义

郑观应又名官应，号陶齋，广东香山县人。大约1842年左右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官僚家庭。据说他“少偶儻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见“盛世危言”彭序，光绪二十四年图书集成局版。以下凡单注篇名者均见该书）。所谓“隐于商”，就是“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行三十余队”（商务）。也就是说，当了买办，是个买办性很强的商人知识分子。

他不但与外人接触密切，而且也曾到国外去过，“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自序），因此他学了不少资本主义的知识，成为当时名噪一时

的洋务通，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洋务派的垂青。凭着有些资财，他在1859、1870、1878各年先后三次捐买官衔，由员外郎而郎中而候选道。1878—1879年因经办山西振捐得李鸿章赏识，在太后面前保举过。同年李鸿章并委他为三品衔候选道募办商务，与彭某共同经理上海机器织布局，全厂筹划主要依靠他，成为当时封建统治头目里热中洋务者争相罗致的红人。总计先后他给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盛宣怀、彭玉麟，乃至醇亲王奕环，经办过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汉口电报，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铁路公司，江西萍乡和安徽宣城煤矿，吉林三姓矿务局，上海医局，粤汉铁路。中法战争时，去退避作过军事活动。在香港与厦门办过接台事宜^①。由此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棉纺织史稿”。

可見，他不但参加了当时的洋务活动，而且本身也有官职，参加过军事、政治活动。这表明了他与封建统治阶级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仅是他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在当买办和办洋务的过程中，与外人的接触很多，而且又去过外国，所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很深。他極力主張仿行资本主义的經濟制度，使民間自办企業，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經濟。他認為要富国必先富民，贊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二編招工）和“民富国亦富，民强国自强”^①的說法。他曾“与……集股銀四十万”（紡織），設上海机器織布局，也曾与友人共办过聚兴公司。这又說明了他有自办企業，向民族资产阶级轉化的要求。

在資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狂潮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他的思想中，較明确的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他写过很多的詩，其中有“一自海禁开，外夷肆跋扈”^②，“群雄各覬覦，利权暗侵夺。俄德窥北轅，法日界南轍。英夷圖中央，圍棋布子密。或借港泊船，或租地筑室。或司总稅务，或代郵傳驛。或为开礦謀，或为訓士卒。鐵路或包工，國債或借撥。措施靡不同，陰謀多詭譎。”^③他已看出資本主义“各国商务日振，國勢日强，民生日富。……工力悉敌，……不得不以亞洲各国为取材之地，牟利之場”（商务）。因此他說，“中国尚不因时制宜，变法自强，必致为人欺侮蚕食，誠在意中也”（三編边防）。在“外患日深，强鄰日逼”（二編水師）的情况下，同时他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洋务运动”从兴起、发展、到毁灭的时代。在他参加洋务活动的过程中，逐漸看到了洋务运动的腐敗和官督商办的工業沒有前途。他且曾以十萬兩銀子投入織布局而吃了洋务派的亏，因此他就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一个改良主义者。

他認為要想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須进行变法維新。“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轅而北轍耳。”他拿易經所說的“穷則变，变則通，通则久”为根据（以上均見考試下），主張变法。他極力推崇俄国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前皇彼得发憤为雄，微服赴鄰邦，考求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三編商务）。“变政如明治，外侮自泯然。”^④他反对洋务派的只学資本主义的皮毛，也严厉批評了洋务派的妥协投降外交政策。他以土耳其、波蘭、印度、緬甸等国为例，警告封建統治者勿蹈其复轍，他說：“若再因循守旧章，裂土瓜分知不远。愆前愆后是良圖，借法自强可弭乱。”^⑤

在“盛世危言”这部書里，他提出了一套改良方案。这部書是他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作品陸續增訂而成的。1862年初版时名叫“救时揭要”。1871、1875年又兩次增訂出版，改名为“易言”。1882年再修訂出版时即名“盛世危言”了。書中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暢其流”的主張。在这套方案中，無論是政治、軍事，或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归根結底都是圍繞着“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業出发。他的思想主張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資本主义的要求，反映了一部分地主、官僚正准备投资于近代工業的情况，反映了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的轉化。

二

怎样走資本主义道路是郑观应思想里的中心問題。

他首先提出了商务的重要，痛斥認為商务是末务的思想，“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商务）。他主張进行商战与資本主义抗衡。他認為“商战为本”，“兵战为末”。“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長。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風吹灯灭。商战之亡緩而无形，譬如油尽灯灭。有形者易备，无形者难防。”^⑥因此他主張“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練兵將，制船砲，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講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三編商战）。这就是“商战为本”，“兵战为末”的理由。为了实现他的主張，他認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实行保护貿易的关税政策，准許民間自办企業，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

他看到“泰西稅法于別國进口稅多，本国出口稅少”（稅則），所以主張中国应“进口稅大增，出口稅大减”（商务）。“凡我国所有者輕稅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稅以遏来源。收我利权，富我商民”（稅則）。他对封建統治势力的困商之政深惡痛絕，“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三編商务）。他認為“病民之端，莫甚于厘卡”，“厘卡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三編厘卡）。他主張“为今之計，不如裁撤厘金，加征关税”（稅則），并換去关上洋人。

① 郑观应：“罗浮鹤鶴山人詩草”卷二，第17頁。

② 同上，卷一，第30頁。

③ 同上，卷一，第27頁。

④ 同上，卷一，第21頁。

⑤ 同上，卷一，第24頁。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編”卷七，第28頁。

厘金是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时为筹餉而設的格外剝削，是当时商民最痛恨之事。裁厘加稅（關稅）的主張是他改良主張中重要要求之一，反映了当时一般商民的正当呼声。

他反对“官督商办”，“名为保商实剝商，官督商办势如虎”^①，要求准許民間自办企業，“凡通商口岸內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輪舟、开矿、种植、紡織、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間開設，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以官場体統”（三編商务）。但同时他又提出要求政府保护商民以进行商战，“第商务之戰，既应借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商务）。

（2）发展机器工業。

当时昏聩的封建統治階級拒絕采用机器，怕机器代替人力，將使“百工农妇无以为生”。他駁斥了这种說法，指出，“若用机器以制造洋布羽毛呢絨等物，則一夫可抵百夫之力”（二編商务）。他認為要想与外国資本主义竞争，必須发展生产，落后的手工業生产是不能与之抗衡的。他觉得中国出口的都是原料，而入口的都是机器制品，这样太吃亏了。所以極力強調采用机器生产以抵制洋貨进口，“洋布羽毛呢每年进口值銀二三十万，是亦中国一漏卮也。亟宜招商集款，購办机器，自行織造，擅其利权”（二編机器）。

他不但認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而且更进一步看出了，“但知購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始得机器无穷之妙也。宜設專厂制造机器。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則各种貨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以上均見三編商务）。这是对于发展生产較透徹的看法，沒有独立的机器制造业，無論如何是沒法与外国資本主义抗衡的。

（3）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業。

他很注意矿产的开采，認為“泰西各国所有致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开矿）。因此“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資民生之利，賴因地之利取无尽而用不竭者，其惟开矿一事乎”（二編开矿）。他反对頑固派以有碍風水阻止开矿，和洋务派以“官督商办”来壟断开矿之权。他主張“开矿之事似宜商办，而官为护持”（船政）。

工商業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很重視发展近代交通事業。他举铁路为例，認為除去“可助国用”、“便于用兵”之外，而且“各处矿产均可开采，運費省而銷路速。……商賈便于販运，貿易日旺，稅餉日增”（铁路）。总之“有十利而无一害”。

他对外国輪船控制中国的航运表示气愤，認為是“喧宾夺主，害不胜言”，“船業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因此他主張自造新式輪船，在沿海增加輪船公司。“今沿海要埠，中国公司輪船日增，則利不外溢，誠塞漏卮，講富强之一大端也。”（以上均見三編商船上）

甲午以前，主張修铁路，办輪船的人并不少，但多从“便軍运”，“助筹餉”出发。洋务派修铁路，办招商局是从所謂“求富”出发，与外国資本主义争点利潤，其实是壟断不讓民营。郑观应则是从利于“开矿”，“販运”，“振兴商务”，使“物暢其流”这一点出发。在当时說来，不能不算是个較进步的主張。

（4）发展農業生产

他虽然重視“振兴商务”，但同时对于農業生产也很注意，認為“富出于商，商出于土农工三者之力。……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三編商战）。他主張“以农为經，以商为緯，本末兼具，互細毕該，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樞紐也”（农功）。他看出“国之賦稅出于人民，民之供亿出于土地”（二編开垦），因此提出了“講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的主張（自序）。他不單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而且認為“若用西国机器以之耕种，可使土膏深透，地力騰达，物类易于收成，亦当倍蓰”（二編机器）。他曾作过一首劝农歌：“天时与地利，化学深研究。磅瘠变膏腴，肥料美为首。机器制新巧，便捷胜人手。”^②他主張国家应派人去国外考察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肥等一切善法，回国后推行。他这种学习西洋技术，用机器于農業来提高生产的主張，是一种改善經營方法，发展農業資本主义的思想，与頑固派的为了维护封建統治，加强地租剝削而主張的所謂“重农”是不同的。

除上述一些主張外，其他如开办銀行、邮局、电报、鑄銀、盐务、賽会、公司等亦均有論述。他認為所有这一切都是“振兴商务”，进行“商战”的根本。只有办好这些事業，才能富国强兵，与外国侵略者抗衡。

三

郑观应并不把中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只看作是一个經濟問題。他認為資本主义国家“富强之本，不在

① 郑观应：“罗浮鹤鶴山人詩草”卷二，第29頁。

② 同上，卷二，第50頁。

船坚砲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敦养得法”。他把改革分为“体”和“用”两个方面，“育才于学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謀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輪船火砲，洋槍水雷，鐵路电綫，此其用也。”他批評洋务派办洋务，只模仿西人的器械，而不革新政治，是“遺其体，而求其用”，根本不足恃的（以上均見自序）。他已認識到，要想实现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必须改变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和代表清朝貴族及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国家政权机构。因此他在政治方面就提出了要求。

首先，他主張設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他認為当时在外国侵略的情况下，中国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除了国家必須加以保护外，工商業还必须建立自立独立的組織——商务公所。而这种商务公所应“毋恃官勢，毋奈紳权。……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同業成集，借以探本業之升降，市面之贏絀，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長之机”（商务）。这种設立商会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階級極力要摆脱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資本的控制与束縛。

他提倡学习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即资产階級的議會制度和創立宪法。他認為議院立就可以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責，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致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議院）。他強調宪法的重要，“宪法不行政难变”（即維新难）^①。他反对君主專制，“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載舟，亦能复舟。”他極力推崇君主立宪制度，“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以上均見議院）。可見他的政治思想的特点，就是君主立宪。

他对原有政治机构的腐敗、贪污、冗官太多等，也提出了改革的意見。对旧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評，主張破格用人，进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扩大人民的知識，培养人材。他說：“中国之士專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將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銷磨于八股五言之中。”（二編考試）。他認為“今日計，宜廢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設學校，广植人材”（敦养）。他还提倡設同文館，譯西書，办報紙等以广开民智。总之，他在这方面的改革主張也是为了“振兴商务”。“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設立机器技艺格致書院以育人材。”（三編商务）而且他在自然科学与人材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也看得

很清楚。

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社會方面改革之策，如禁烟、恤穷、改造游民和犯人。他也提出了一些权宜应敌之謀，如巩固边防海防，練兵練將，練民兵以助官軍等，求对付資本主义当时的侵略，使中国不致馬上灭亡，以等待变法維新，国富民强。

四

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六十年代以后到戊戌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主張中，受当时中外主張維新人士論調的影响很大，像馮桂芬、薛福成、英人李提摩太、哲美森、德人化之安、以及日本人的一些提倡維新变法的著作，他都仔細閱讀过，而且很多收录在他的著作中。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書中專紀时务，凡中西利弊情形，或得自閱历中来，或聞自中外友朋，或輯自近人論說，随手笔录。……惟求有益于国計民生，无论士农工商之言，悉为臚取編入，以备当道采擇施行。”^②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輔以西学（立宪）”（西学），是一种君主立宪論。这和洋务派所主張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区别的。

甲午以前，具有明确的議院思想的人是不多的。馬建忠虽曾在其“上李伯相出洋工課書”中提到了“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达”，湯震在其所著“危言”一書中也談到議院，但观点还很模糊，对議院的性質也弄不清。薛福成虽然贊成設議院，主張君主立宪，但又認為君主專制和资产階級民主各有利弊^③，对君主立宪的主張很不坚定。再如何啓、胡禮垣虽然在“新政真詮”之“新政議論”中，对議院的組織及議事規則等都有較詳細的論述，但他們的最后結論是“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对階級社會中，統治与被統治的关系不加分辨。只有郑观应的議院思想比較明确。

郑观应的比較明确和具体的改良主义思想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階級的利益。当时因为日益增長的經濟要求与現存旧制度之間发生了矛盾，历史提出了以适合經濟发展的新制度代替衰朽的旧制度的要求，而他的思想正反映了这种要求。他提出了变法維新的主張，并与封建統治階級进行了思想上的斗争，打击了清政府的君主專制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前的时候，他極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是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

① 郑观应：“罗浮荷鶴山人詩草”卷一，第45頁。

② 郑观应：“處世危言增訂新編”凡例。

③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四。

求，在这一点上是与人民的愿望相一致的。

戊戌以前的改良主义者均是著书立说，鼓吹变法和自强。但他们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性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则起了先驱作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盛世危言”是当时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必读之书，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王韜的“庸書”齐名，在社会上流行。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郑观应接受了前期的维新思想，同时又对以后的改良派有所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是，郑观应的思想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首先，在其政治、经济等各项主张中，到处反映了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依赖。他认为“商务之战”、“振兴商务”必须依靠官权的“护持”和政府的“振作”。他把变法寄托在“皇太后、皇上聖德日新，励精圖治”上（三編边防）。因此他的要求无异是“与虎谋皮”，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質还认识不清。他想借某些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对付其他的一些帝国主义。这说明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質，还不认识。他也曾幻想变法的主张能够得到某些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不知道帝国主义要求中国作某些方面的改革，只是为了更利其侵略。

此外，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理論上的落后。虽然他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但同时他又拥护封建主义的“綱常名教”。因此他的具体政治主张是与其理論互相矛盾的，即一方面要求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开议院、行宪法；但同时又认为“聖人之道”的“道”不可变。因此根据这样的論点，他也就只能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而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民权的思想。君主政体是应该保持不变的，反对的只是君主专制而已。

再者，他虽然反对“泥古守旧，不思变通”，但在他的思想主张中似乎也有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

他把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称之为“中学”。他说西洋的机器和格致是“中国本有之学”（西学），“今天竟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輿、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諸学无一非暗襲中法而成”（藏書）。他认为报纸就是中国古代的“太史采風，行人問俗”（日报），学校就是古語上的“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学校），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議員也附会成是“中国乡举里选之制”（議院及三編公举）。但必須说明，他与封建地主阶级顽固守旧的“复古主义”及循环論的历史观还是不相同的。他的仿效“三代之遺風”是与“仿泰西之良法”相结合的，目的是“制无分古今，法无論中西，苟有利于民，有利于国者，行之可也”（邮政上）。这显然与那种“泥古守旧”，“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是不同的，只不过是怕封建统治者太顽固了，接受不了他的变法主张，才用“托古改制”来实现。这种“托古改制”的思想正是向封建地主阶级妥协的一种产物与表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在于其软弱性及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性。经济上不能健全的发展，政治上也就显得软弱无能。由于没有社会基础，因而郑观应的一切主张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能是一种紙上談兵。但縱然如此，可是在革命派尚未有形成之前，这种改良主义的维新思想，变法主张还是有其一定进步作用的。正像毛主席所说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①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1081頁。

更正

本刊1957年9月号封里“世界历史参考图片（二十）”下漏排“古代兩河流域”一行字；目录頁中国历史参考图片与世界历史参考图片的頁次应改为“（封底里，封底；封里）”。

本刊啓事

本期付印之前，有一篇文章因不能刊用，临时撤下。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补发其他文章，因此本期頁数較原定少四頁，特向讀者致歉。